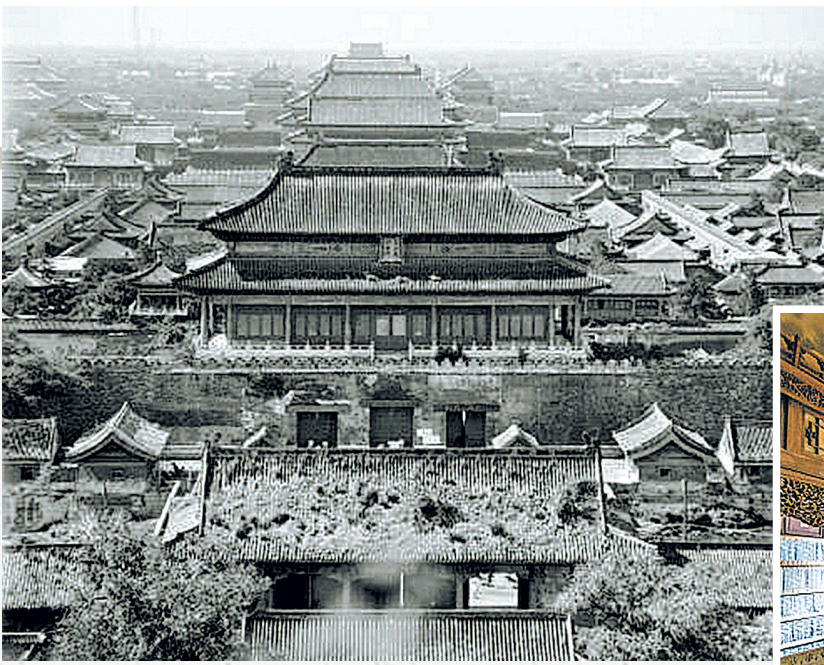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故宫神武门及建筑群。(摄于1925年6月)



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处。

凭窗读史

历经十年修缮重新对外开放 养心殿的历史细节

历经十年修缮,故宫养心殿重新对外开放。自雍正皇帝开始,养心殿成为清帝寝宫及日常处理政务的场所,皇帝的卧室和办公室是什么样呢?是不是奢华?藏着什么宝贝?又发生过哪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呢?

“三希堂”之名从何而来

养心殿位于乾清宫西侧,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。在明代,养心殿主要为皇帝起居听政之外闲居的宫殿,也是皇帝常常用膳的地方。清代自雍正皇帝起,养心殿成为皇帝寝宫及日常处理政务的场所。三希堂是养心殿的西暖阁,原名“温室”,乾隆十二年(1747年)更名为“三希堂”。

三希堂是皇帝在宫中最小的书房,由南北两间小阁组成,每间小阁的面积仅仅4平方米左右。那么,“三希堂”名称由何而来呢?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乾隆皇帝在御题《三希堂记》中表达了取名的两个原因。

一是乾隆帝最喜爱的三幅书法珍藏在此处。乾隆帝认为宫中珍藏的秘本中有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;后来又得了王珣的《伯远帖》,这些都是世间罕见的珍宝,在养心殿将它们收藏,因此命名“三希堂”。(“内府秘藏王羲之《快雪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,近又得王珣《伯远帖》,皆希世之珍也,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‘三希堂’以藏之。”)二是乾隆帝仰慕蔡世远的“二希”。“二希”语出宋代周敦颐《通书》“士希贤,贤希圣,圣希天”,意思是士人希望成为贤人,贤人希望成为圣人,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。蔡世远是乾隆帝的老师,他认为“圣希天”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,因此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二希堂”。乾隆帝则使用了“三希堂”的名字,既蕴含了“希贤、希圣、希天”的深意,也表达了他仰慕恩师“二希”的志向,并希望效仿恩师追求圣贤之道的情怀。 (“则吾今日之名此堂,谓之为希贤、希圣、希天之意,可也。慕闻之先生之二希,而欲希闻之希亦可。”)



养心殿匾额。

雨顺相关,通过这种方式,表达美好的愿景。

两宫在此初垂帘

所谓“垂帘听政”,就是皇后或太后用帘子遮隔着和大臣沟通,管理国家政事。咸丰十一年(1861年)七月,咸丰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,6岁的独子载淳嗣位,年号同治。由于同治帝年幼,慈禧太后拉拢慈安太后,联合恭亲王奕訢,发动辛酉政变,打倒了顾命八大臣势力。同年十一月初一,两宫皇太后(慈禧、慈安)在养心殿东暖阁首次垂帘听政。到同治十二年(1873年)正月,载淳年长亲政,两宫皇太后被迫撤回归政。此次听政持续12年。

从光绪元年(1875年)至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两宫皇太后进行了第二次垂帘听政(其间,慈安皇太后于1881年去世);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至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,慈禧太后进行了第三次听政,但不再“垂帘”,且听政场所主要在乾清宫西暖阁,西苑勤政殿和颐和园仁寿殿。

民国时期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里记载了光绪时期的垂帘听政形式: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刚开始听政时,光绪帝坐在中间,慈安太后、慈禧太后分别坐在他后方的左右两侧,两位太后与光绪之间有纱幕遮挡着;慈安太后去世后,慈禧太后独自坐在纱幕后听政;而到了光绪戊戌年(1898年)时,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并肩而坐,犹如两位君主一样;大臣们上奏并回答询问时,光绪帝沉默不语,不发一言。有时慈禧太后会用手肘轻轻碰他,示意他说话,但他也只是简短地说上一两句就罢了。

延伸阅读

养心殿的研究性保护

2015年12月18日,“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启动仪式”在故宫博物院举行。“研究性保护”,即在对养心殿进行修缮过程中,将科学研究、科学修复、预防性保护及人才培养等理念贯穿其中,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典型范例。养心殿研究性保护的内容非常丰富,以室内裱糊修缮为例,主要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:一是虫害问题,二是传统技艺的科学运用问题。

科研人员在勘察过程中发现,养心殿部分区域存在虫害问题,尤其是仙楼佛堂内虫蛀严重。佛堂长期处于封闭状态,室内空气不流通,空间狭窄;室内又有木装修、裱糊纸张和贴落,其中的纤维素、木质素成为白蚁的主要食物来源。佛堂内的裱糊纸张表面普遍有虫蛀孔洞,木龙脊表面有沿着木纹方向的虫道,以及残留的虫蛻。

养心殿的裱糊在清代就出现过虫害问题,传统的治理方法是在裱糊的糊糊中掺入杀虫除菌的中药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,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养心殿室内裱糊的糊糊中就掺有番木鳖、黄柏、秦花等中药。道光年间,养心殿西暖阁、勤政亲贤、三希堂等处的糊裱裱糊纸张,所用的糊糊里面掺有雄黄。此次在养心殿室内裱糊的研究性保护中,上述中药均得到了科学研究及合理运用。

传统技艺的科学运用,是养心殿室内裱糊修缮的重要内容,盘布是裱糊的一道重要工序,是将纸张裹贴在木基层的表面。盘布所用纸为“二纸一布”,即在两层纸之间夹一层布。纸一般为高丽纸,布则选用苎麻布,裹贴好后坚硬牢固,经久耐用。盘布时一般选择1个、4个或6个空格为一个单元操作。

首先计算好所用盘布纸(底纸)的尺寸,使之略大于该单元平面尺寸,将其糊刷在木骨架表面;其次,将多余的部分沿着45度方向裁剪,并将其向上翻卷,贴在骨架侧壁,以增加盘布纸与龙骨的接触面,提升顶棚、墙面的耐久性;接下来,在木骨架十字相交处附近钉上小钉子,以进一步增强盘布纸与木骨架的拉接性能;最后,用小块高丽纸将钉眼糊上,以避免钉锈渗透表面纸影响美观。此裱糊方式产生的视觉效果,犹如盛开的梅花,因而又称“梅花盘布”。

周乾

百年前清宫遗宝清点见闻

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,该院为此推出“百年守护——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”大展,展品有《清明上河图》《五牛图》《伯远帖》等书画珍品,以及白玉盘龙钮“大清受命之宝”、青铜莲鹤方壶、唐代大圣遗音琴等器物。

故宫藏品甚多,那么,在一百年前溥仪离开紫禁城后,宫里的珍品是如何清点的呢?从文字学家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的相关记载中,可以管中窥豹。

钱玄同两探古物陈列所

钱玄同自号“疑古”,是新文化运动中最为坚决的“破旧立新”者。紫禁城于他而言,不啻于一个巨大的“古董”,他应当不会有什么兴趣。然而,世事难料,钱氏却在因缘际会之下,参与到故宫博物院筹建初期的相关工作中。

且说1924年突发“逼宫”事件,溥仪逃出宫外,一时间,舆论大哗,各种立场、各种意见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新文化运动阵营里,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拍手称快。溥仪被逼出宫次日,钱氏伏案疾书,写了两千多字的公开信。十天之后,周作人等主办的《语丝》创刊(1924年11月17日),钱氏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这封公开信,题为《恭贺爱新觉罗·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》。

标题里“恭贺”二字的出现,摆明欢欣鼓舞的态度,要公开庆祝逊帝被赶出皇宫。因此,此信也可以视作新派知识分子群体对“逼宫”事件的公开表态。本就在辛亥革命之后宣布退位的溥仪,在钱玄同看来,理应尽早从龙椅上走下来,尽快成为普通国民才对。为此,在钱玄同看来,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,远比一个子虚乌有的“皇帝”称号重要得多,所以他要恭贺溥仪。

不仅如此,钱玄同还对溥仪爱读书,爱文学表示赞赏与鼓励,还列了推荐书单,张罗了名片设计方案。

当然,调侃归调侃,钱玄同除了表示对“逼宫”事件的支持之外,似乎并无别想。他没有想到,溥仪离宫之后,当局随即组建“清查善后委员会”,其核心任务是对收回为国产的清宫进行清查。清查包括清点宫内现有物品,并与宫内原有物品登记册一查对,彻底查明清宫的家底。由于清查内容涉及宫内各种珍宝与文物,所以又邀请教育部与内务部联合主持清查工作。钱玄同也在受邀参与的学者队伍之中,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据《钱玄同日记》记载,他首次进宫,并关注到宫内古物遗存近况的时间是1915年1月2日。那一天,他偕长子“秉雄进东华门……游清三殿,又至武英殿,看古物陈列所中器物,只有瓷器、漆器及字画笔墨数种而已,其他概未之见,岂尽于此乎?抑未移尽乎?抑残留此数乎?”

显然,钱玄同对初次所见的清宫古物陈列之数量与质量,都是有疑问的。为此,在日记中连发三问,颇有难以置信之意。第二年,1916年元旦这一天,他又去观赏了清宫古物,这一次陈列品中增添了一些古代青铜器,但他却认为:“色泽似不甚旧,恐什九皆赝器也。”

看来,钱氏对清宫所藏古物是有着自己的判断与预期的,那些对普通民众公开展览的古物,激发不了他的兴趣。钱氏觉得这些随意拣选的陈列品价值并不算高,甚至还有赝品。在此后的七年间,钱氏日记中再没有提到清宫古物及其相关话题。

因专业而受邀清点古物

1923年6月26日,钱玄同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次清宫失火的情况。文中这样写道:“因天气热,困不着,起,见东北角红光烛天,不知何事?次日看报始知清宫大火,而溥仪却要守他们的什么臭规矩,将神武门紧闭,故延烧二三点钟云,哈哈!”看来,钱氏对清宫突发火灾的紧急事态,竟然是完全抱以幸灾乐祸的态度,且对逊帝溥仪仍盘踞宫中颇为不满。

由此可以想见,一年之后“逼宫”事件的突发,钱氏自然是乐观其成。至于当局稍后开展的古物点查工作,由于对古物本身并无多大兴趣,钱氏的热情并不高。不过,能进宫



紫禁城之便门。 辑自《燕京胜迹》

翻阅历代文献及古物,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那些品级较高的文物,对于专攻古文字学研究的钱玄同而言,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。毕竟,在溥仪离宫之前,“大内”禁地并不是普通学者能涉足的地界,古物陈列所的设立也属于初级阶段,并没有真正展露清宫的宝藏。

1925年1月6日,钱玄同与马幼渔一道吃午饭,听说在宫里发现了新莽时期的文物,随即将该一消息记录在了日记中。在此之后,这一年日记中关涉“故宫”的相关记载,次数逐渐增多,篇幅也开始扩容。

据日记来看,钱玄同作为故宫点查工作小组成员之一,第一次赴故宫工作的时间原本应为1924年12月25日,但因故并没有到岗。其人真正到岗,即第一次进入故宫工作的时间实为1925年1月8日,这一天的工作内内容,他郑重其事地写入了日记。当天因杨遇夫(即杨树达)的缺席,他还被派为组长,行监督点查之职。

须附带一提的是,钱玄同缺席第一次故宫点查的情形,尚可据单士元的忆述来印证。据单士元忆述,他首次进入故宫进行点查工作时,人员安排大致为:“担任点查清宫文物的人在神武门集合,组长陈去病,负责查报物品名目的是徐鸣寅、马衡,负责写票的是董作宾、庄尚严,负责贴票的是罗亲汉、徐炳昶,事务记载是魏建功、潘传霖,照相一人,还有裘善元、俞同奎、杨树达、吴瀛、易培基负责监视。一切准备工作就绪,只因为警察没有到场,那天没有查。”

在单氏忆述中,第一次故宫点查工作的大致情形如此。行监督之职的杨树达在场,而钱玄同确实是缺席了的。当然,因为负责保安工作的警察没有到场,点查人员虽然就位,却并没有开展实际工作。

须知,当年点查故宫的实际情况,乃是举国关注的大事件。工作小组不敢怠慢,每进行一次都登报公示,何时何地开展,哪些人参与,点查了哪些物品,都一一罗列公布,都是有案可查的,且有报纸照登。譬如,钱玄同缺席的这一次,《时事新报》就以《点查清宫物件报告》为题,于1925年1月4日刊发了工作简报,当天之所以没有顺利开展,可能还与清室方面并不配合有关。报道中提到:“清室方面,始终置之不理,以奉段祺瑞之命为辞,现经内次王来设法转圜,故二十七日仍在继续进行中。”

为加快点查进度,清室善后委员会又抽调政府各部人员,加派至点查工作团队之中。抽调的这些人员名单,也在南北各大报刊上刊登出来,予以公示。1925年1月28日的《时事新报》,即以《点查清宫助理员加多》为题,公示了这一名单。教育部加派人员中,赫然出现了“周树人”的名字,看来,当时鲁迅也曾参与其中,只不过较之钱玄同参与的时间还稍晚,且属于加派助理员身份。

点查乾清宫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,直到1925年2月16日,《时事新报》仍时有刊登点查清单之类。

惟对五色墨感兴趣

话说因点查组实行轮流负责制,钱玄同曾有四次轮到做组长。首次被委派为组长的那次,故宫点查正式从乾清宫开始。从其日记来看,什么玛瑙碗、青玉片、宋砚之类,均未入其“法眼”。三个小时的点查,只是例行公事而已,并没有令其特别兴奋的发现。第二次轮到做组长时,又恰逢放假,免司其职。但此时溥仪出逃至天津的消息传来,钱氏对这一消息极为敏感,准确地预言了日军将利用溥仪。第三次轮到做组长时,恰逢孙中山先生逝世,点查组放假暂停工作,这组长之职也就暂免。一个月后,第四次轮到做组长,点查如意轩。

仅据其日记所载,在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,钱氏的故宫点查工作,从1925年1月到4月,共计三次,分别在乾清宫、懋勤殿、如意轩。只有在如意轩中点查到的两箱五色墨,令其略有兴趣,因为墨上刻着“回氏”二字,让这位章太炎弟子、古文字学专家,一时竟也弄不明白是啥意思了。据查,“回氏”即“墨神”的意思,仍是中国传统思想中“万物有灵”的思想使然,语自《说郭》卷三一,书中引《致虚杂语》曰:“墨神曰回氏。”

4月16日之后,至10月10日这段时间,钱氏日记中,没有再出现与清宫或故宫相关的任何内容。这也可以视作,其参与的清宫点查工作,可能确实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接下来,无非是静待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,并向公众全面开放。

故宫全面向公众开放是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10日创立当天。不过,此前就根据点查工作的进度依次开放了。就在钱玄同点查如意轩两天之后,即1925年4月18日,故宫就已将点查完的部分依次开放。

1925年4月23日,《时事新报》第四版之上,以可观篇幅报道了故宫开放的安排。在这篇题为《清宫开放部分一瞥》的报道中,开篇即简明扼要地公布清宫先行部分开放的这一重大讯息:“京讯:清宫(室)善后委员会为应各界之请求,前月决定将清宫一部分先行开放,并订有参观规则。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两天为开放之期,每人收券资一元。十八、十九两日,即开放日期,前往参观者颇不乏人。”

随后,报道逐一列举并介绍了部分开放的清宫区域,有乾清宫、昭仁殿、弘德殿、懋勤殿、批本处、内奏事房、南书房、敬事房、上书房、端凝殿、北小库、交泰殿、坤宁宫、宫外神竿、坤宁宫东暖殿、坤宁宫西暖殿、寿药房、御花园等处。

肖伊伊